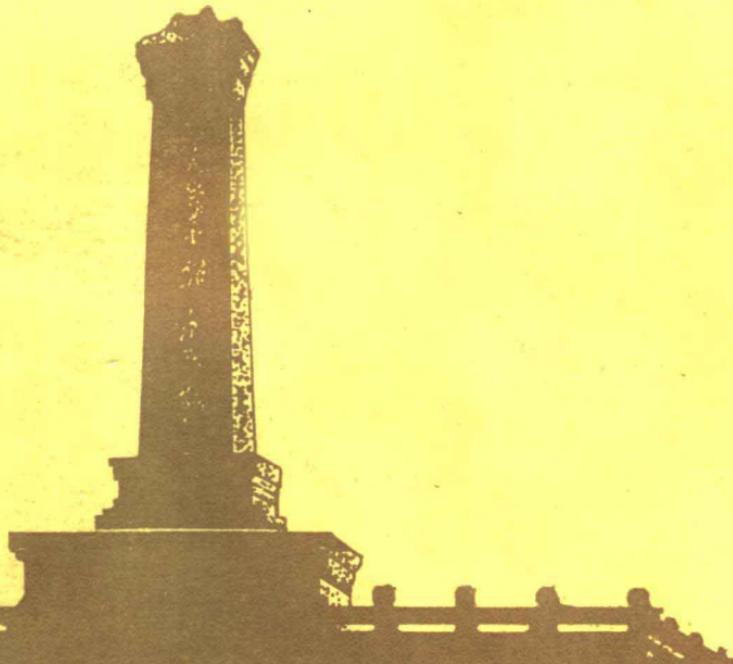


22.05

革命烈士和党史人物传略

第一集



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

革命烈士和党史人物传略

第一集



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
一九八七年三月

前 言

中共榆林地委书记 霍世仁

陕北是我国和我省建立党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大革命时期，在李大钊负责的北方区委的领导下，魏野畴、李子洲等同志先后来我区宣传马列主义，建立党、团组织，后来成立了绥德地委和榆林地委，领导了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及各界群众运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斗争，使陕北成为当时我国北方革命运动高涨的地区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陕北特委领导下，我区党组织积极武装工农，开展游击战争，开辟革命根据地，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特别是1935年冬，毛主席、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陕北作为陕甘宁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党中央和毛主席在陕北生活和战斗了十三个春秋，陕北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尖锐复杂的斗争，培育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许多优秀儿女献出鲜血和生命，陕北高原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英烈，仅我们榆林地区就有革命烈士7800多名。

烈士和革命前辈们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有的宣传马列，不避艰险，忘我工作，面临白色恐怖，播撒革命火种；有的出生入死，奋不顾身，武装工农，坚持人民战争，开辟革命

根据地；有的在战火纷飞的沙场上，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壮烈捐躯；有的在血腥的刑场上，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例如陕北、陕西以至西北党组织的创建人魏野畴、李子洲，创建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群众领袖刘志丹、谢子长，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先生等，他们都是陕北人民优秀的代表，是民族的精英。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烈士们流血牺牲，和全国人民一道，谱写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壮丽凯歌，创建了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陕北党史、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的英雄形象和崇高精神，是共产党人为实现党的纲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光辉榜样。他们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顾全革命大局的精神，以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同群众紧密联系和自我批评的三大革命作风。

当前，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满怀信心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改革的潮流势不可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学习和宣传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继承革命传统，对于端正党风、促进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有着重大意义。为了缅怀先烈、激励人民、发扬革命精神，继往开来，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将出生于我区及在我区活动过的著名革命烈士和党史人物传略编辑成集，内部刊印，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热切地期望全区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职工干部、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能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学习先烈们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振奋精

神，投身到改革建设的洪流中去，为发展榆林、振兴榆林建功立业，为彻底改变榆林地区的面貌，谱写出新的篇章。我们相信，在革命英烈崇高精神的鼓舞下，在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中，一定能培养和造就一代“四有”新人，使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确立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为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为搞好四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革命烈士们永垂不朽！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日

目 录

前 言	崔世仁	(1)		
魏野畴	张守宪	董建中 梁星亮	王少民 徐超山	(1)
李子洲		张守宪 张军孝	董建中 梁星亮	(20)
王懋廷		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	(38)	
杨明轩			李敬谦	(45)
杜斌丞	马文瑞	刘澜波 孔从洲	王炳南 常黎夫	(55)
王瀛		姚寅虎	刘书礼	(69)
张友清		霍成勋	樊子琚	(77)
白明善		刘杰诚	宋新勇	(84)
霍世杰简传		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	(90)	
乔国祯简传		中共佳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93)	
田作勤简传		中共定边县委党史办公室	(97)	
编后语			(101)	

魏野畴

(一八九八——一九二八)

张守宪 董建中 王少民
梁星亮 徐超山

魏野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和宣传活动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宣传救国救民的真理，创建和发展陕西党团组织，建立党的统一战线，领导陕甘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创建皖北工农民主政权和红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曾经深情地说：“魏野畴是老同志，有学问，他还有著作，我读过，写得有水平。”^①

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魏野畴，原名魏凤标，号明轩，一八九八年三月八日生于陕西省兴平县板桥乡魏家村。祖父魏兴德、父亲魏焕章和两个叔父都是农民。全家九口人，有土地六十余亩，大都是坡地，一家人终年辛勤劳动，打下的粮食仅可勉强糊口。

野畴不满三岁丧父。七、八岁时，进本村私塾里念书。

^①孔从洲：《魏野畴二三事》；《魏野畴传略·回忆·遗文》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私塾先生康玉堂对野畴也很喜爱，常夸他学习用功。一九一二年冬，野畴同农村姑娘何玉杰结婚。

一九一三年春，野畴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①在三秦公学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逐渐关心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一九一五年五月，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竟然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因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消息传到陕西，野畴义愤填膺，在进步教职员的支持下，同刘天章、杨钟健、李子洲、呼延震东等同学一起，积极地投入了反日反袁的斗争。

一九一七年春，野畴中学毕业。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说服了母亲和妻子，又取得了亲友、同学的同情和资助，赴北京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史地部学习。

野畴到北高师上学不久，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此后，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传播到中国。野畴接受新鲜事物很快，对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热情赞扬。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野畴积极投入了这一爱国运动，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文化、新思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参加北高师进步师生组织的讲演团活动，担任平民学校、夜间补习学校的教学工作，决心献身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

一九二〇年冬天，野畴在北京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一年，野畴撰写了长达十五万字的《中国近世

^①1915年三秦公学与西北大学中学班合并，改称陕西省立第三中学。

史》，初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释中国近代的历史。

把马列主义传播到陕西

一九二一年夏，野畴在北高师修业期满，回到陕西，应华县私立咸林中学校董、教育界知名人士杨松轩的邀请，到该校任教务主任兼历史教员。他热心教育事业，立志改革教育，改造社会，除主持教务，每周授课二十四小时外，还抽空在华县、西安等地调查教育状况。

野畴回陕以后，同在北京进行革命活动的陕籍同学刘天章、杨钟健、李子洲等，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九二一年秋，天章、钟健、子洲等人创办了《共进》半月刊，并计划出版《共进丛书》，写信给野畴征求意见。野畴回信表示极积赞成。

野畴在咸林中学倡新摒旧，精心育人，受到大多数师生的崇敬，但也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排挤，于一九二二年夏被迫离开华县。

去北京后，一边修改《中国近世史》书稿，一边从事革命活动。这一年的十月间，他和刘天章、杨钟健、李子洲、杨晓初、赵国宾、呼延震东等人在《共进》半月刊社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了陕西旅京学生的进步团体共进社，以《共进》半月刊作为机关刊物，团结进步青年，同混沌污浊的社会开展斗争。注意世界革命潮流和国内政治局势，开始了《共进》的新阶段。野畴既是共进社的领导人之一，又是《共进》半月刊的积极撰稿人。他先后在《共进》上发表了

十余篇文章，宣传反帝反军阀，宣传马列主义，倡导移风易俗，改革教育，改造社会，号召青年积极参加革命斗争。

一九二三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野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春，野畴应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长、著名进步人士杜斌丞的邀请，由北京经山西赴榆林，任该校国文和英语教员。当时陕北经济文化落后，消息闭塞，榆中虽为陕北最高学府，但由于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仍沿袭着封建教育那一套内容和方法，师生读经尊孔，校园死气沉沉。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魏野畴，一到榆林，便决心致力于传播新文化，传播马列主义，改造这种摧残青年、令人窒息的环境。课堂上下，他为学生讲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介绍《向导》、《新青年》、《共进》等革命刊物上的重要文章。他对学生们说：“人家拿刀架在咱们的脖子上，不起来救国，国亡了我们还有书读吗？”^①野畴善于团结群众，富有组织才能，作风朴实，平易近人，经常利用课余饭后的点滴时间，到学生宿舍谈心，或与学生们一起散步聊天，讲述革命道理。学生们视他亲如兄长。在他的指导下，学校整顿了学生自治会，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话剧研究会，学生走出校门，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欺骗人民的斗争，开展破除迷信，反对苛捐杂税和拉夫拉差的斗争，还积极开办贫民学校，利用假期到农村宣传，激发人们投入火热的革命洪流。

为了唤醒民众，他曾编写了历史话剧《爱国贼》，描写

^①李力果：《陕北苏维埃的创始人之一——魏野畴》，载《红旗飘飘》第5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12月版。

一位爱国青年深入军阀巢穴，盗出了军阀与帝国主义签订的卖国密约，揭露了军阀卖国的丑恶嘴脸。话剧演出时，他亲自扮演主角，把那位爱国青年机智、勇敢完成任务的义举，生动地表现出来，使观众很受感动。

野畴在榆林时，还结识了杨虎城将军，二人过从甚密。野畴经常向杨虎城讲解中国政治形势和我党的方针政策，对他后来参加国民革命，同共产党合作，走上逼蒋（介石）抗日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野畴在榆中的革命活动，被陕北军阀井岳秀发觉，也遭到校内封建遗老遗少的敌视。他们阴谋迫害野畴。杜斌丞很关心野畴的安全，但也无能为力。是年暑假，野畴被迫离开榆林。

野畴在华县和榆林任教不到两年，两次被迫离职，但却影响和培养了许多进步青年，指引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刘志丹、吉国桢、潘自力、高克林、阎揆要、王子宜、曹力如、苏士杰、霍世杰、刘文蔚等都是他的学生。这些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陕西地区党团组织和革命军队的骨干。

野畴在咸中和榆中任教期间，每月薪金几十块银元，收入并不算少。但他将这些钱主要用来购买进步书刊、接济贫苦学生和资助了《共进》半月刊。对于自己，花每一文钱都要仔细盘算。那件布袍、长衫，已经穿了多年，也不肯更换新的。至于家庭的困难，他很少照顾。

创建西安党组织

一九二四年春至一九二六年春，野畴先后在西安市省立第三中学和第一中学任教务主任与教员。在此期间，他除搞

好教学外，主要精力都倾注在建立党团组织，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工作上。

一九二四年春天，野畴应他的老同学、省立第三中学校长刘依仁的聘请，就任该校教务主任兼公民教员。

是年暑假，他同共产党员崔孟博，在崔的家里举办了暑期讲习会，吸收西安各个中等学校的几十名进步学生参加，学习马列主义，讨论如何开展学生运动。讲习会期间，适逢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派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武止戈回陕建立团组织。野畴和止戈一起，多次召开进步学生座谈会，讲解团的性质、任务和入团的条件。

不久便在西安建立了第一个青年团支部。这个团支部归团中央直接领导，先后发展的团员有张秉仁、高克林、刘子温、张含辉、焦启凯、许乃谦、张汝慎、宁克齐、秋步月、党维荣、任致远、师守命、张金印、何挺杰等。

为了便于团支部和团员在群众中开展活动，同年七月，野畴又领导发起成立了团的外围组织——青年文学社，出版《青年文学》旬刊。同年十一月将青年文学社改名为青年生活社，次年二月又将《青年文学》旬刊改为《青年生活》旬刊。野畴亲自起草了《青年生活社纲领及章程》和《青年生活》创刊宣言，明确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全国青年联合起来”、“全国妇女解放”等口号。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社员发展到一百四十余人，遍及西安各个中小学校，成为进步学生的核心，有力地配合了团组织的活动。

一九二五年初，野畴和共产党员雷晋笙、吕佑乾及教育界知名人士王授金，联合西安各人民团体经过协商召开代表

大会，成立了陕西省国民会议促成会，通过了野畴参与起草的宣言和致孙中山、段祺瑞及各省区国民会议促成会三电文。宣言号召全陕民众乘此良机，起而追随拥护民众利益之国民会议，并望国人作一致之主张。野畴领导团组织、青年生活社，联合各界进步人士，同任陕西督军兼省长的刘镇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掀起拥护我党和孙中山先生主张的召开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

正当全国促成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走向高潮时，孙中山于三月十二日不幸在北京逝世。噩耗传到陕西，野畴和王授金、雷晋笙、吕佑乾、张含辉等，于四月十五日在西安主持召开了有五、六万人参加的“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野畴等在大会上讲了话。这一年，陕西全省掀起的驱逐军阀吴新田的运动，这也是在野畴领导下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野畴等又把驱吴斗争和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结合起来，领导各界群众召开大会，游行示威，发表通电，表示“誓随同胞死力奋斗，务期收回租界，完我国权”。他自己亲率驱吴请愿团赴耀县，吁请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杨虎城将军率部参加驱吴斗争。不久，野畴又应杨虎城的邀请，担任杨部咨议兼三民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为革命培养军事干部。

七月上旬，野畴在三原主持召开陕西省学生第一届代表大会，成立省学生联合会。大会讨论通过了驱吴斗争和谋求学生永久利益等十三项决议案。接着，野畴又出席了共进社在三原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作了共进社纲领及组织案的报告，批判了主张解散共进社的错误意见；还同各地代表共同商讨，提出了开展农运、工运、学运、妇运、兵运等议案。

在野畴等同志的领导下，陕西人民的驱吴斗争不断高涨。吴新田见群情激愤，又有国民军的援助，恐遭歼灭，遂于七月中旬率部向西撤退。吴军行至虢镇，遭杨虎城部队的截击，被歼两个团，残部狼狈地逃往汉中。驱吴运动至此取得了胜利。

革命者总是把已经取得的胜利当作新的斗争起点，野畴也是这样。同年七月下旬，他怀着驱吴斗争胜利的喜悦，带领省学联和团组织的负责人，从三原回到西安。

他从三原返回西安不久，就征得上级党组织的同意，创办了《西安评论》三日刊。这个理论性的刊物创办初期，从组稿、写稿、审稿，到编排、送印、校对，以至发行，野畴亲自干。由于野畴和他的战友们辛勤努力，《西安评论》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二日创刊到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共出版三十六期。它反映了陕西人民的革命心声，指导了陕西人民的革命斗争，深受省内外各界群众的欢迎，发行量高达二千余份。被称之为陕西“革命舆论的唯一指导者”。人民群众因此更加尊敬野畴，称他为陕西青年的“导师”。

还在“九七”纪念之前，即一九二五年八月间，野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指示，和刘含初、王授金、杨明轩、李子洲等共同发起成立陕西国民党党员聚乐部。不久，又同上述同志一起，在中共北方区委派来的共产党员安存真的指导下，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野畴在临时党部里担任领导工作。临时省党部以共产党人为核心，团结国民党左派，积极发展组织，大力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以焦易堂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斗争。

“九七”纪念之后，共青团中央和中共豫陕区委派吴化之到西安。野畴和雷晋笙、吕佑乾与吴化之一起，整顿了西安的团组织，成立了团的特别支部和西安地委。接着又成立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吴化之任书记，野畴、晋笙等任委员。这是在西安地区建立的第一个中共组织。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一九二六年初，经中共中央和豫陕区委批准，中共西安地委正式成立，黄平万任书记，野畴任委员，负责宣传工作。这期间，野畴除积极为整顿团组织、建立党组织奔波操劳外，还曾负责选派青年学生中的党团员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和去北方国民军作兵运工作。

一九二六年一月，野畴和王圣域、师守命作为陕西代表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相当比重。中共中央决定，在会议期间成立由张国焘、林伯渠负责的出席国民党“二大”党团，野畴被指定为党团的西北组组长。

在这次大会期间，野畴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彭湃、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他抓紧时间，学习广东党组织和毛泽东、彭湃等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学习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进行东征时作政治工作的经验。大会闭幕后正值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筹办，党派野畴去北方为农讲所选拔学员。他立即赶到北京，与李大钊、陈毅等一起，选拔了五、六十名党团员和有志青年去广州。这些学员中有乔国桢、李维屏、霍世杰、杜松寿、马致远、刘友珊、李波涛、亢维恪等十六人结业后返回陕西，对开展陕西的农民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领导陕甘人民进行大革命

赶走刘镇华，西安解围之后，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野畴由三原随国民军到达西安后，根据中共西安地委的决定，领导举办了党员骨干训练班和政治队。政治队设农民运动班和军事政治班，学员一百多人，绝大部分是各地党组织选送的。

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正式成立，于右任、邓宝珊任总、副司令，野畴任政治部副部长，主编《新国民军》报。一月底，国民党陕西省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野畴当选为执行委员，后又兼任宣传部长。他和其他共产党员一起，利用国民党这个组织形式，广泛的宣传国共合作的意义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大政策，动员民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二月，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耿炳光任书记，野畴和李子洲分别负责宣传、组织工作。三月中旬，野畴和炳光、子洲一起主持召开了陕甘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制定了《目前工作计划》，提出“党的工作原则是工作集中”，口号是“党到农民中去！”^①党代会根据形势发展，决定改组西安、绥德、渭南等三个地委；新建三原、延安、榆林等地委；成立直辖区的特别支部六个、属各地委领导的特别支部三十多个。区委还以国民党省党部和驻陕总部的名义创办了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野畴常应邀去做报告。这两所院校为革命培养了近千名政治军事干部。野畴

^① 《陕西省委通讯》第一期（1927年9月），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负责的宣传工作搞得更是出色。五月一日，野畴亲自主编的区党委机关刊物《西北人民》正式创刊，成为指导西北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喉舌，被陕甘人民誉为“西北革命的急先锋”。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大屠杀。陕甘区委领导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野畴、李子洲和国民党省党部的其他负责人、共产党员刘含初、赵葆华、史可轩、张含辉等，以省党部的名义，向全国发出讨蒋通电。

一九二七年六月，出师河南的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七月上旬，冯玉祥致电在陕西留守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参谋长石敬亭，提出反共“三原则”。①西安警备司令部按照冯玉祥和国民党反动中央的指示，于七月十五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发出严禁共产党人活动的命令，强令解散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进会、学生联合会等革命团体，并缉捕共产党的领导人魏野畴、李子洲、杨明轩、刘天章。七月中、下旬，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被解散，成立了以石敬亭为主席的反动的陕西省政府。与此同时，冯玉祥连电急令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负责人是中共党员史可轩、许权中）和中山军事学校（史可轩、李林为正副校长）一千多人由西安开赴河南前线，妄图乘机消灭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革命军队。一时间，黑云翻滚，白色恐怖笼罩全陕，陕西人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和全国一样，遭到了失败。面对逆转的时局，新任中共陕西省委②军委书记的魏野畴，不悲观，不气馁，英勇地同叛变了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同省委的其他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决定，拒绝执行冯玉祥的反动命令，指示史可轩、许